

民族研究情报资料

摘 编

3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民族研究情报资料摘编
第三期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一九八六年五月出版

33.7
144
1.3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1986年5月30日

目 录

民族研究文摘

- 关于确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几个问题…………… (1)
- 论原始民族…………… (2)
- 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3)
- 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4)
- 研究清与浩罕关系史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5)
-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的变迁与当前面临的问题…………… (6)
- 古代云南的民族舞乐…………… (8)
- 满族传说“尼山萨满传”的三种未经出版的抄本…………… (9)
- 《古兰经里兰茨对照译本中的中世纪突厥语词汇表》序…………… (10)
- 关于现代蒙古语的闭音节化现象…………… (12)
- 《阿眉斯语课文》序…………… (13)
- 关于《皇輿全览图》西藏地图的绘制问题…………… (14)

民族研究动态

- 国外近年来的西夏学研究…………… (15)
- 《藏文史料译文集》…………… (16)
- 英译大藏经的百年计划…………… (17)

日本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国际性·····	(18)
第二十次野尻湖会议·····	(19)
1945—1957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及政治演变·····	(20)
第七届应用语言学国际会议·····	(21)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拔分校召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23)
苏联柯尔克孜语言文学和民间创作研究概况·····	(24)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项目 《解放前鄂伦春族教育史稿》完成·····	(26)
《新疆历史研究》创刊·····	(28)

民族研究新书介绍

《中国民族学概论》一书出版·····	(28)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出版·····	(29)
《民族学研究》出版·····	(30)
日本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	(30)
日本出版《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一书·····	(31)
日本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	(32)
《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	(32)
《〈八旗通志〉点校》出版·····	(33)
《文化接触和语言聚合》一书简介·····	(34)
《阿尔泰诸语言中动词的时系统》·····	(35)
《象雄语》·····	(36)
《维吾尔文学简史》介绍·····	(38)
《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	(7)

关于确立民族间 事实上平等的几个问题

确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性质问题：列宁关于确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理论是和形式上、法律上的民族平等对应提出来的，它属于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范畴。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第一次胜利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并着手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为此，列宁提出“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表明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根本区别。确立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实际保证广大劳动群众享受最广泛的民主权利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本性所决定，是属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范畴的问题。

斯大林关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是对列宁上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他指出，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没有力量象先进民族的劳动群众那样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他们的权利”。因此，确立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就是要从经济文化条件方面保证各族人民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确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过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

确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属于民主范畴，这是由产生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原因决定的。只有在民族间发生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时，才影响到民族间的政治状况，才表现出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说，民族压迫既是造成民族间法律上不平等的根源，也是造成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源。另外，还必须看到，列宁、斯大林提出的确立民族间事实上

平等的问题，不是泛指在一般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之间、而是特指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作为压迫民族的先进民族与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之间的问题，是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遗留给无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问题。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告诉我们，民族间法律上的不平等是民族压迫的直接后果，只要废除民族压迫制度，这种不平等即可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民族压迫的间接表现，它不能随着民族压迫制度的废除而立刻消除。这两种不平等性质虽然不同，却都源于民族压迫；消除它们的方法虽然有别，但都属于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范畴。实现形式上的民族平等和事实上的民族平等，是无产阶级民主制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它体现了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阶段性、连贯性和彻底性。

关于确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标准问题，斯大林讲得十分清楚。在全面领会斯大林论述精神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消灭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标准概括如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是否确立了，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是否消除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是否像先进民族的劳动群众那样充分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他们的权利。在这里，帮助各落后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是途径，是手段，目的是使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都能同样享用“民族权利平等”所赋予的权利，就算完成了确立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任务。这是问题的关键。（下转第33页）

论 原 始 民 族

一、氏族部落是以四大要素为基础的原始民族

在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中，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氏族部落不能形成为民族。学术界持不同意见者都把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作为判别民族形成的标准。那么，氏族部落作为历史上最早的人们共同体，是否也具有这四个基本要素呢？作者认为，氏族部落已初步具备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四个要素，它们应该是民族的一种类型。

首先，氏族部落作为人们共同体，具有共同语言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集体的成员，除了只有语言等等之外，并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其次是共同地域，氏族部落都有特定地域，这种地域“包括村落所在地，及该部落从事渔猎的，且能防御其他部落侵略的周围地带。第三是共同经济生活，马克思描述的尚处于野蛮时期低级的易洛魁人部落，正是他们在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生活。最后是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指这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的自我意识，忠诚热爱之情等等，它常表现为民族同胞间的相互卫护、援助，以及在受到外来干涉时的一致对外。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所赖以表现的文化，在原始社会里其形式主要是宗教节日、祖先崇拜、风俗习惯等。氏族部落的血亲复仇的特征正是民族一致对外，同胞团结互助的强烈的民族共同意识的最集中表现。

氏族部落既然已具备了四大要素，当然

也就是民族。其内部的血缘联系不但不能成为否认其为民族的理由，反而正是氏族部落作为原始民族区别于阶级社会文明民族的重要特点，是促使民族部落人们共同体产生的前提和稳定的纽带。

二、“Völk”与“Nation”区别

德文“Nation”或“Nationalität”的意思是“民族”或“国家”，也就是说，这个词在作民族解时，其内涵也包括有国家一词的某些因素，还没有国家出现时期的民族则不能用“Nation”或“Nationalität”一词，显然这个词的民族意义正是阶级社会内的文明民族。德文“Völk”或“Völker”是广义的民族，它当然也包括原始民族在内，可以用来表示原始民族。

三、地缘联系取代血缘联系是原始民族发展到文明民族的标志。

否定有原始民族存在的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地缘联系是民族形成的前提，民族只有在地缘联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实际上是把阶级社会初期出现的地缘联系与近现代才可能出现的全民族的地缘联系等同起来。最初的地缘联系不会有全民族的地缘联系，因为这许多地区即农村公社都是各自独立的。这种早期的局部地区内的地缘联系不是原始民族也不会是文明民族形成的前提，它不能成为联系全民族的纽带。只有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才逐渐形成全民族的地缘联系。

所以，对原始民族持否定观点的研究者

(下转第15页)

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内容异常丰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从唐朝时吐蕃占领敦煌、到848年张议潮驱逐吐蕃镇将，其后，张曹两家统治敦煌，前后达二百年，这一段历史牵涉到的中国国内民族及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都是过去所不详者，靠着敦煌文献的帮助才弄清楚。石室中藏有不少地理佚书，比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释家地志》、《沙州城土境》等、连著

名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石室中也藏有残抄本，所有这些地理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有重要作用。

第二、敦煌石室藏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超过其他方面。首先是变文的发现，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的故事，一类是中国历史上的故事。这种新文体实际上开了宋代“平话”的先河，可过去我们对此毫无所知。其次是诗歌，长篇叙事歌曲《董永行孝》、《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以及《晏子赋》、《韩朋赋》等，都是新发现的文学史史料。在艺术方面，包括壁画、绢画、雕塑、书法、石窟建筑、音乐、舞蹈等，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对研究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敦煌石室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国语言学 and 音韵学有关的古籍残卷，比如《字室

碎金》、《俗物要名林》等，在敦煌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语，对研究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演变的重要作用，是在别的文献中找不到的。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卷子，其中有古藏文、粟利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古藏文卷子不但保留了藏族的材料，而且还能用来补证汉文《尚书》等古籍，回鹘文残卷保存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材料。一些现已不存在的民族的语言，我们曾毫无所知，只是由于敦煌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才使它们重见天日。

第四、唐代敦煌地区佛教流行，石室藏书中、佛典约占95%，多数是手写本。有的佛经已经失传，有的译本与现在的不同，石室中道教的经典有大量发现，如《太玄真一本际妙经》等等，这些都对校勘古籍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第五：除了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外，还有不少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石室中有《本草》残卷、医方残卷；有天文历算的书籍，如二十四气七曜日历。

第六：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在建筑、石窟艺术和雕塑、壁画风格上，到处可看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及中外文化交融的痕迹，如敦煌石室中发现了梵文本《心经》，和唐代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及有关中印技术交流的敦煌残卷。

世界上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

原作者：季羨林

公保扎群摘自《红旗》86年第3期

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一、中原文化的北移

中原文化北移，是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过去在史学研究中，只注意中原经济南移，不注意北移，只注意南方的发展，不注意北方的发展。中原文化北移是研究金代文化史中一个重要问题。金代中原文化北移是以汉人、渤海人以及通晓汉族语言的众多民族为基础的，特别是金初培养了一批通汉语和中原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为中原文化北移打下了基础。

金代中原文化北移的重心转到河北、山西，主要表现在：金代名士大夫合到北方。《金史·文艺传》所载金代文人可统计的有三十二人，其中中都路五人，河北东西路七人，西京路四人，河东南北路五人，北京及东京路六人，山东东路四人，大名路一人。可见金代文人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从科举看金代文化重点也在北方，现查金朝进士有籍贯者二百三十八人，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及东北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只有百分之一三点四在黄河南的山东、河南、陕西。从文化城市的分布看也主要在河北、山西。金代刻书中心有四处，只有一处在河南的东京。从金代文化形成发展以及传播看，其人物也多出北方。刘撝天会元年词赋进士，雅好成就后进，当时名士大夫多出其门下，故为一代词学宗。辽东熊岳王遵古及其子庭筠皆名高当时，张浩子多学于王家，其门生颇多，如李渤、王诗及字画。金代中原文化北移，使北方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改观，它吸引着更多的中原文人向北流

动，使掌握中原文化的民族更加扩大，使具有中原文化的区域也空前的扩大。

二、儒、道、释三教合一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金代文化发展趋势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三教合一是当时北方士子与女真统治者在政治上走向合作和融合的反映，同时也是三教发展中的自然趋势，从三教合一的趋势看，儒教的三教合一因受传统的儒士反对，是不彻底的、不敢公开的；佛教不受礼的约束，改革是大胆的；道教则是折衷的；金代文化发展的趋势，也表现在民族上，多民族出身的士人合一于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之中，是中原文化精华被多民族所掌握的结果，女真中第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人即海陵王完颜亮，亮与其兄充同学儒学于张用直、通经史、好词、“一咏一吟、冠绝当时”，契丹人耶律履、博学多艺、善属文，将《尚书》《孟子》视为“圣贤纯金之道”。兀惹文人主要出自张、李两大姓，如李靖父子、张澄、张子厚等。金代文化发展的趋势也表现在地域上，即不同的地区都被中原文化合一到金代文化体系之中，中华各民族不仅在民族上也在地区上走向新的一致，构成了多民族、多地区的中原文化分布网。

三、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发展多民族文化

金代文化是北方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文化。因而它在对后来元朝的影响来看，比南宋更要直接些。在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问题上，金是联合吸收和发展的，南宋则是排外

(下转第17页)

研究清与浩罕关系史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浩罕并非在清代中国疆域之内。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古代疆域的确定绝不能仅仅以汉族所建的中原王朝为依据。浩罕同辽、金、西夏等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一样，是中国的政权，是在清代中国版图之内。

这就牵涉到：一、怎样认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二、怎样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与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关系；三、怎样认识清代的中国的版图这样三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些实行大一统的王朝疆域应是历史上中国疆域的主要标志，而十八至十九世纪初清代中国的版图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最终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界则是我们考察历史上中国疆域时应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提出，不应一提到某部族与中原王朝有“藩属”、“朝贡”的记录就不加分析地认定其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不应一提到某个部族与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就简单地认定它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不应把中国少数民族所及的地方一律说成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

关于第三个问题，笔者指出，所谓清代版图，应以清实行实际有效统治的地方为界。具体地说，要看清朝是否在那里设官建制，是否驻有军队或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巡视，是否对该地人民征收赋税等等。

基于以上原则，笔者认为，浩罕一度是清的属国，但未进入清朝版图，不在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之内。主要理由是：

一、尽管浩罕曾向清朝称臣入贡，清朝

也曾令其“一切事务俱遵驻扎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节制”，但清却从未在浩罕派驻军队、设置任何军政机构、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因而未对其实施实际有效的统治。它与清一度建立的“藩属”、“朝贡”关系，属于版图之外的宗主附属国性质。

二、中国史籍中有关“大宛”、“宁远”之类的记录，说明历史上汉唐最盛时一度统治到费尔干纳。但该地区未纳入十八至十九世纪清大一统的版图之内，故不宜视为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根据。

三、浩罕系乌兹别克为主体的封建主建立的独立汗国。一般来讲，乌兹别克族是由当地土著与由里海南下的月即别人融合而成，其中虽有蒙古因素，但不足以认定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结论：清与浩罕的关系是中外双边关系，而非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

沙俄吞并浩罕，是侵略和征服中亚的一个独立的乌兹别克汗国，并非侵占我国有领土；

清与浩罕关系的下限当在沙俄正式宣布原浩罕为费尔干纳省的1876年，而非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1884年；

阿古柏为首的浩罕封建贵族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南部的活动是外国外族入侵者对我国的侵略和骚扰，而不是少数民族的叛乱。

原作：潘志平

胡岩摘自：《中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四期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的 变迁与当前面临的问题》

以村社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制是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村社可以说是社会的细胞，它既是一个较完善的社会组织系统，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消费系统。与内地农民相比，西双版纳傣族农民表现出了对村社集体较强的依赖性，而缺乏生产、生活的独立性。加上历史、地理、民族各方面的条件制约，这个社会表现出极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政治上，阶级矛盾不尖锐；经济上，自给自足性强；文化上是佛教（南传上座部）影响深，行为准则统一、生活模式少变。

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是多方面的，而且出现许多曲折反复。随着1956年的民主改革、1958年的“民主革命补课”和人民公社化，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1969年的“政治边防”等历次运动的开展，传统社会及其原有文化受到很大冲击。内地政治和文化影响不断增强，傣族人民的家庭生活和个人观念意识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了解这一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迁，对于解决当前傣族社会面临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粮食生产与产业结构问题。尽管今年四月国家废除了粮食统、派购政策，然而由于傣族“稻作文化”的传统影响，西双版纳地区的稻米种植业仍是主要产业。总的说来，第二、第三产业等于空白；第一产业中农业与林、牧、副、渔各业比例失调；农

业中，粮食作物与其它经济作物比例失调。

（二）商品生产问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至今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生产率低。能够反映商品生产发达状况的“两户”（专业户、重点户）表现为量少、质次、分布不均。这些情况说明传统的自给自足、安于现状的文化价值观念依然支配着大部分人的思想，制约着他们的行为。由于人们缺乏“富上加富”的进取愿望，落后的生产力与社会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国内基本矛盾，在傣族地区表现不大突出。结果，没有需求作为内在动力的商品生产，总是举步维艰。

（三）文化教育问题。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景洪等七个公社总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率平均为55.3%，而全省仅33.7%；小学入学率平均为41.4%，而全省是83.3%。

西双版纳傣族文化教育落后最为深刻的原因是：现代文化教育尚未最终成为其生产和文化心理上的需求。在目前，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仍占主要地位，生产靠的是积累的经验而非现代科学知识。当上学连获取一个吃商品粮的职业都无法保证时，傣族农民就很难再供子女上学了。另外，傣族自古形成高于周围少数民族的文化，造就了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对外来文化有贬视心理是一方面，重视本文化，如信奉佛教的人生礼仪和一套有关的社会化方式，是另一方面。傣族文化心理都能由传统文化得到满足，因

此比山区民族接受外文化稍差。改变傣族这种文化落后状况的办法应当是，从生产和文化心理两方面给予刺激，使其出现新的、强烈的需求。

探究了社会传统与当前问题的内在联系之后，谨提出几点参考意见。

(一) 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明确认识到改变落后的社会旧传统乃是搞活全盘的一着关键棋子。

(二) 组织农民群众外出参观。以往选派外出参观人员时过多考虑干部，回来后能起的示范作用有局限性。如果今后适当选派在农民中具有群众基础，有一定威信而又具备与大多数农民同等生产条件的人外出参观学习，则回来之后现身说法，影响力和感召力较广。此外，所择参观地区应在自然条件、民族条件方面与版纳有一定的可比性（如广东、广西和德宏州等）。

(三) 采用技术密集型经营方式。傣族地区地广人稀，不宜采用内地那种劳力密集型经营方式。采用技术密集型方式一可节省劳力，二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政府应扶持农民解决机械化实施中的技术和资金问题，并且设法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四) 加强指导性计划管理。傣族农民除对土地的依赖外，还比内地农民多了一个对村社的依赖，表现在生产经营上缺乏独立经营能力和经验，缺少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要使他们致富，各部门应加强对农民产前产后的服务，完善指导性计划工作，减少市场盲目调节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损失。

原作者：谭乐山

胡鸿保 摘自第三届全国
人类学学术讨论会论文
(单行本)

游迁者——阿卡人 「泰国密林中的」

美国作家和文化历史学家F·V·格朗菲尔德在三个西方人类学家顾问汪·格索博士，保尔·刘易斯博士和凯米尔的协助下，写了《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一书。作者在一个

阿卡寨子度过了几个星期，随后长途跋涉到接近缅甸边界的一些阿卡村寨访问。作者报导了他们许多方面的情况：如阿卡祖先南迁情况；头人、铁匠及男女老少的的生活情况；传说和史诗对他们的影响以及风俗习惯等；另外，字里行间也提到了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内容丰富，描述细致，有助于了解民族情况。书中所写的阿卡人与我国哈尼族有着共同的族源关系。原书于1982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时代——生活》图书社出版，系《荒野民族》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五章。各章后有插图及其简短说明。书后附有参考书目。

供稿：碧 旬

古代云南的民族舞乐

关于远古云南舞蹈，文献记载，极其简略，如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说：“文成颠歌”，文颖注：“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颠与滇同也。”这就是最早的文献记载。如再往上溯，就得借助考古发掘了。

1956年以后，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发现了数千件青铜器物中，就有一批形象生动的舞俑、舞纹，按现代舞蹈分类而言，就有独舞（在昭通汉砖上也有）、双人盘舞、四人舞、八人舞、十八人舞、二十二入舞、或更多人的群舞（均出自石寨山）；从类型来分，有羽舞、干戚舞（相当于周代的文舞、武舞）、匏笙舞、徒手舞、鸟冠舞等；铜质乐器也很多，为曲管葫芦笙、铜鼓、铜钟、编钟等等。说起铜鼓，川滇黔桂粤等省均有发现，而楚雄万家坝出土的五面铜鼓，经测定为春秋晚期之物，即公元前八世纪的文物，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铜鼓中年代最古者；编钟，石寨山发现的六个，与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编钟相仿佛；此外在楚雄万家坝发现铜鼓的同时，也发现了六个羊角编钟，后来在牟定又发现了六个编钟，均为五声音阶，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造型古朴无纹，可能是照中原地区或楚国的编钟而仿造。云南的开发历史，向来都说“庄蹻开滇”，而上述铜鼓和编钟却在庄蹻入滇之前就有了，这又说明了周代的中原文化早已传播到边疆。除了青铜乐器之外，还有陶制乐器，如呈贡在东汉墓葬中发

现了抚琴陶俑和吹箫陶俑，富民也发现了一种陶制的吹奏乐器，传为周代之物。这说明了滇中地区的舞乐出现较早。

从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其制作年代约当汉武帝或稍后，但这类舞蹈的产生就绝不限于西汉，可能古已有之，一直流传了下来。就在这些舞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舞者裸体，在腰间拖有一条饰物，这样的舞姿确与青海大通县孙家窑1973年出土的彩陶盆上所绘舞姿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个陶彩盆据测定是五千多年前我国原始舞蹈的图象，那么石寨山出土的舞纹也就较为古老了。那条腰间的饰物，西方学者希尔思等人释为“遮羞布”，或曰带有“刺激目的”的“色情舞蹈”，（见其所著《艺术的起源》）。其实，这饰物是“衣著尾”，语出《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后渐相滋长，种人皆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世世相继。”在古哀牢国时就有此习俗，而青海的陶彩盆上同样有此饰物，也可能是古代氏羌部落的习俗，他们从西北再往南迁徙而传入滇地。同书又载：“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俗多游荡而喜讴歌。”这又证明，大姚一带的先民也是喜爱歌唱的民族，由此可见，古代云南民族歌舞的起源甚古。

原作：顾 峰

市民摘自《楚雄方志
通讯》1985年3期

满族传说《尼山萨满传》的 三种未经出版的抄本

乔万尼·斯塔里 (Giovanni Stary) 复制, 1985年于西德的威斯巴登出版。

本书根据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 (现为东方学研究所) 所藏的抄本复制, 书前有复制者撰写的绪言及全部抄本的罗马转写。

在绪言中, 作者首先追溯了自1961年(苏)沃尔科娃将满族传说《尼山萨满传》的抄本公诸于世之后, 满族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在此之前, 主要是欧洲学者, 普遍把满族文学简单地看作是汉文书籍的“译作”, 他们以为满文的功用仅仅是帮助人们理解和注释艰深的汉语文言文而已。直至《尼山萨满传》被整理出版之后, 加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满文抄本被陆续发现, 以及中国国内研究满族的热潮正在兴起, 人们对满族文学的知识才得以大大扩充, 才了解到满族无论是在诗歌上, 还是在散文上, 都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学的。

除此而外, 《尼山萨满传》的出版还激起了人们对满族萨满教研究的广泛兴趣, 作者认为这是沃尔科娃的最大功绩, 因为自十八世纪以来, 欧洲人对满族萨满教的知识, 是一直仅仅限于清朝钦定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所叙述的爱新觉罗皇族所举行的萨满教仪式之内的。

《尼山萨满传》现存的三种抄本, 一种是1908年在位于齐齐哈尔东北的Mejser搜集到的, 第二种1909年发现于瑗瑯附近, 而第三种, 亦即由沃尔科娃出版的那种, 1913年发现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三种抄本之

外, 作者特别提到了1961年金启综在所著《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一书中所搜集的女丹萨满的传说, 并将其全文转录, 认为它表明了在整个东北地区这类传说混和的广泛程度。

作者接着指出, 沃尔科娃所选的是三种抄本中最完整的一部, 其它两部在内容上均有残缺, 他之所以要将三种抄本同时复制出版, 是由于它们在满族语言的研究上颇具意义。

第一种, 日期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抄本《尼山萨满传》第一章〔满语: Badarangga doro-i gosin ilaci aniya boji bithe nizan z'ame bithe emu debtelin〕这种抄本的最大特征是音节的再分, 提示着某种重音节奏的韵律, 很可能是受到汉语的影响。

第二种《亚森萨满传》第一章, 一本教义的书。〔满语: Yaseñ sama-i bithe emu debtelin decin-i bithe inu〕。这个抄本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的祷词部分, 尤其是女萨满为了进入伊儿们汗的城池而念的祷词, 应特别引起注意。它与沃尔科娃出版的抄本中相应段落的祷词几乎完全不同。

第三种名为《尼山萨满传》第二章,〔满语: Niz'an saman-i bithe jai debtelin〕可能有误。因为从内容等各方面来看, 它显然是另一抄本, 而不是第二种的续篇, 何况二者日期也不同, 相同的只是在第一页都署有里图善的名字。从这个抄本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汉语的影响。

《古兰经里兰茨对照译本中的 中世纪突厥语词汇表》序

在大约二十年前，杰出的突厥学家曾经以不少优秀的著作较好地解释中世纪东部突厥语做出一定贡献的占诺斯·依克曼（Janos ECKmann）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古兰经的译文及其注释上来了。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他就竭尽一切努力来研究保留在曼彻斯特约翰·里兰茨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中的古兰经译文。非常幸运的是，他在都柏林切斯特·贝蒂图书馆(Chester Beatty Library Dublin)发现了两件巨幅的但并不完整的手稿残片。

依克曼为了从事研究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但是，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使他没能完成这一工作。然而，词汇表这一最重要的部分业已完成。在中世纪东部突厥语的研究上，除了A·K波罗夫阔夫（A·K·Borovkov）类似文字的词汇表（LeKsika serdneaziatskogo tefsira XII—XIIIIVV, Moscow 1963）之外，这个词汇表是最重要的参考指南之一。

遗著中的突厥文正文和阿拉伯、波斯文注释以及英文译文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改正的部分仅仅是由于缺乏文字上的润饰而造成的少量的、技术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除了结尾部分以外，作者是用拉丁文书写波斯文注释的，为了保持一致起见，在这部分里全部使用了拉丁字母转写，并且将阿拉伯文词汇也做了转写。缩略语表是在手稿的基础上制定的。

原序的散失提高了这一工作的难度。幸好，这一空白由于公允的解决得到了弥补：依克曼的一篇简单扼要的研究论文《古兰经的东突厥文译本》作为介绍文章在《东方匈牙利文库》（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Vol. XVII, PP 149—159, Budapest 1971）上刊布了。它对目前已为人们所知的古兰经的各种东部突厥文译文逐一地作了简要的综述。里兰茨手稿及在现存书中可以见到的词汇表，在译文的综述中是第二件。这项篇幅简短扼要的研究成果为理解和使用这本书提供了必要的、极为重要的方法，文中没有再另附其它解释性的文字。

作者本还打算对原文作些简短的语言学的分析，但是，这一点没有得以实现。为了弥补这一点，让我们参考一下依克曼简短论文之一《逐行对照的古兰经中世纪东突厥文译本》（《Eine ostmittel türkische interlineare Koranübersetzung》）（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31卷，1959，72—85页，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XXXI, 1959, PP 72—85）。这篇短文探讨了最早发现的古兰经译文的语言特点。这个译文是黑汗王朝时代的，而注释却是花喇子模突厥语。里兰茨手稿的语言也是黑汗王朝的，掺杂着一些花喇子模语。这样，依克曼较早的简短的论文对这一译文提供了有价值的看法。他并没有暗示这两份原文的突厥语是相同的。其实，前一个译文的年代是可以确切地断定产生于1333—1334年，而第二个译文的日期却是无从考证的。A·明尔那（A·Mingana）（目录第27页）断定它的抄本

是十五世纪的，依克曼则明确地把它归到十三世纪下半叶或十四世纪上半叶。

里兰茨手稿是包括阿拉伯文正文及波斯文、突厥文译文的三种语言的逐行对照本。波斯文正文跟在阿拉伯文后面，突厥文正文跟在波斯文后面。不仅古兰经突厥文译本是波斯文译文插在阿拉伯文和突厥文正文之间；而且塔什干手稿也属于此种类型（参见依克曼文章的第三部分）。为什么波斯文对古兰经的突厥文译文是必要的呢？根据依克曼的一般的观察，突厥文译文在一些章节中比较同阿拉伯文原文一致，而在另一些章节中，较波斯文译文就显得有些拥挤了。依克曼认为，这后一种情况是较平常的。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突厥文译者在翻译阿拉伯原文上为了求得准确而需要波斯文（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或许情况相当异样。在最早的波斯文文献中，有不少古兰经的译本及其注释。突厥文译者可能了解了这些译文并受到鼓舞，并将这些穆斯林的神圣的手稿从波斯文译成了自己的文字。波斯文译文中最古老的，并且必定是最有名的是塔巴里注释（Tarjama-i Tafsīr-i Tabari）的译文之一（约于十世纪下半叶）。波斯文译文是集体劳动的结果，它可能是第一个突厥文译文的兰本。这个本子没有传下来，虽然关于这个古本，我们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

G·拉杂尔第（G·Lazard）在《波斯文散文古代手稿中的语言》（La langue des plus anciens monuments de la prose persane, PP. 42—43）一文中研究了H·亚格麦（H. Yagmāi）在德黑兰出版的塔巴里著作的翻译，这一著作是与保存在巴黎的残片相接的。依克曼认为，里兰茨手稿的波斯文比亚格麦的要古老得多。以突厥文词汇的波斯文注释为根据来断定这一表述是困难的，假如是那样的话，里兰茨手稿的波斯文原文对研究伊朗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其它的突厥文手稿也说明了依克曼这样的观点，即转抄者在转抄过程中无意中将转抄人自己的方言特点带进了原文。这样，抄写人的方言特点有时在古兰经的黑汗王朝语言中出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依克曼关于鲍洛夫阔夫（Borovkov）所精心撰写的古兰经注释的评述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古兰经的译文是黑汗王朝语，但是注释的语言，讲述故事的语言和与经文内容有关的语言却是花喇子模突厥语。鲍洛夫阔夫的古兰经注释的译者可能依据的是波斯文的样板。G·拉杂尔第（op. cit., P57）要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波斯文注释——在和古兰经译文的文学风格的对比上——受到了较广泛的人们的偏爱，因为那里有许多包含有方言特色的生动的口头语言。鲍洛夫阔夫古兰经注释的花喇子模突厥语很有可能是当时活着的语言。比起有些古黑汗王朝突厥语的文风来说，它对读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紧紧地把握住这个观点去仔细品味突厥文的注释是很有价值的。

依克曼的遗著对弄清东部突厥语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无疑会颇有裨益的。阿拉伯文词汇表是由T·依万毅（T·Iványi）转写成拉丁文的，波斯文是由Eva·杰瑞米尔斯（Eva·Jeremiás）转写成拉丁文的。手稿的编辑、校订工作是由阿尔泰学副教授E·斯奎兹（E·Schütz）完成的。

原作者L·里格梯（L. LIGETI）

史铸美 摘译自 Janos Eckmann所著《Middle Turkic Glosses of the Rylands Interlinear Koran Translation》一书（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76）

关于现代蒙古语的闭音节化现象

蒙古语的“弱化元音”是指具有发音时产生弱化以及颞化等特征的非重音的短元音。由于词重音常常在词的第一音节上，所以刚才说的语音现象出现在第二音节以下的短元音里。蒙古语里产生弱化元音时，往往有以下几个条件：

1. 词末（开音节）短元音的极度弱化和消失是现代化蒙古语的很突出的语音现象，然而位于词中的开音节短元音也是极其不稳定的，而且还可以观察到已经开始消失着的现象。总之，把这些语音变化可以用一句话归结为“开音节弱化元音的消失”之现象。但我们看到在现代蒙古语开音节内的主要语音中比较稳定地保持着弱化元音。

2. 随着“开音节弱化元音的消失”，词中也出现了新的弱化元音的现象。它是在 $C_1C_2\check{y}$ （ C 表示辅音、 $\check{y}$ 表示弱化元音）的连续形式中出现的，其中 C_2 是b、g、m、n、l、r、j的场合出现。 $C_1C_2\check{y} \rightarrow C_1C_2\text{'} } C_1\check{y}C_2$ 这种语音变化毕竟和语音转位是等同的，而且我们认为短元音的插入是由于上述辅音的浊音性质所导致的。（附带说明一下，在词中 $h=\beta$ 、 $g=r$ ）。例如：arbá “+”（ $\rightarrow$ arb） $\rightarrow$ aráb。

3. 蒙古语里除同首音节外，以元音开头的音节是不存在的。所以，就如在上述2中见到的那样，在词中弱化的那些元音是把它前面的辅音从原来的音节中间分开后插入的。此时，被分开的辅音前面的弱化元音要消失（这是开音节化的结果）。例如：turšílrá “实验”（ $\rightarrow$ turšíl $\rightarrow$ turšílár） $\rightarrow$ turšílár。

4. 还有，由 $C_1\check{y}C_2\check{y}$ 的形式连续构成的场合，笔者认为出现（ $\rightarrow C_1\check{y}C_2$ ） $\rightarrow C_1C_2$ 的辅音连续现象，其中 C_1 是b、g、G、m、n、l、r、j； C_2 是等于t、C（=ts），č（=tʃ）、z（=dz）、ž（dz），š（=s）（另外，在 $C_1=S$ 、X； $C_2=t$ 、tʃ的场合也是相同的）。例如：gereči “证据” $\rightarrow$ gerč。在别的场合里 $C_1\check{y}C_2$ 的形式保持着辅音间的弱化元音。

原作者：栗林均

朝克 摘译自《言语研究》第87号177页。



《阿眉斯语课文》序

联合国科学文教组织 (UNESCO) 在它的基本教育研究中, 指出写、读和算的技巧, 是“获得更丰满, 而且有创造力之生活的必要方法。”它对于整个世界文盲的调查结果, 认为“人民较高的识字水准, 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且“比较平均的所得分配, 也是与减少文盲比例有关。”何况在一九五〇年, 平均世界上每五个成人中, 常有两人是文盲。因此在今天的世界上, 为了与“无知和文盲搏斗, 传布基本知识和寻求知识的方法。”仍然非常需要实施基本教育。

在任何基本教育的计划中, 我们用作教育媒介的语文, 势必决定其效能的范围。联合国科学文教组织报告在使用本族语言的教育情形中说: “教一个小孩子的最好方法是用他本族的语言, 他这样学比用生疏的语言媒介要快得多。”关于一族之本族语言并非其国家的正式语文的这种情况而论, 那篇报告说: “倘使一个小孩子在一个社会中长大, 而这个社会所用的语言又不同于其国家公用的语言时, 为了熟习他政府事务需用的语文, 接近世界历史、新闻、艺术、科学的水准起见, 他必须学第二种语文。”这报告分析得十分清楚, 它认为, 为了达成这种目的, 使他们先把本族语文学习通顺, 总比不认识本族语文, 而先学习第二种语文好得多。

那篇报告说: “最近在很多地方所得的经验证明, 如果学校开始即用其本族语文, 作为教学方法, 而以第二种语文作为一个课目, 自然能有平均或充分使用第二种语文的能力。”它也指出, “使用本族语文是达到使用第二种语文的一座桥梁, 这可节省钱和劳力。”其理由在报告中下列两点观察里, 分析得清清楚楚: 第一、一个小孩子“会感到把握任何与他自己文化环境相异, 而且不能用他本族语文表现出来的新概念。”第二、“在学第二种语文时, 使用他本族语文, 可以有助于文化和语文基础的建立。”因此, 联合国科学文教组织得到如下的结论: “即使那些人民的语言是一种土语, 他们在根本上必须学习用第二种语文, 去思索、说话和阅读, 我们相信, 无论在心理论和教育学上用两个快速的步骤——是用本族语文, 从文盲变成识字, 再从认识本族文字来认识第二种语文——来达成这个目的, 总比用一个跃进的方法——就是连本族语文都不认识, 而硬去学习第二种语文要顺利得多。”

这本阿美语新初级本是帮助阿美族民众, 采用联合国科学文教组织报告中所提到的, 两个快速步骤的第一步, 那就是, 帮助他们从未受过本族语文教育中, 进至受本族语文的教育。然后使他们能充分而有效的进入国定语文教育的步骤。那么他们也能欣赏用他们自己语文所写的文学作品, 使它在他们中间, 成为基本教育的有效工具。

这本阿美语新初级读本是把一九五六年由基督教福音协同会以前出版的阿美语初阶, 予以校正和扩充而编成的, 它是遵循着心理语音学教学方法编成的词汇中的阿美语, 是以下列各乡村所用的语言为代表。例如: 丰滨乡的Fakong和M'akotaay, 瑞穗乡的Pa'ilasen, 玉里镇的Tokar和Ancoh, 长滨乡的Cyokangan, 成功镇的Singko, 大部分的字是出自五百